■聚 焦

21世纪的上海爱情

——潘向黎小说新论

□何向阳

大约20年前，我曾写过潘向黎小说的评论，写谢秋娘那篇，她仍记得。稍早一些还有一篇写60年代生人的小说综论的，其中也有论及潘向黎小说的段落。那些言说，经了岁月风霜，已经安放在书页中了，能够记起来的，好像仍是《十年杯》中的风一样纠缠、温润又凛冽的心绪，或者还有，那个坚强也深情、脆弱又韧性、敢爱敢恨的谢秋娘，那是我们青春的一部分。如今，也许还有？只是深埋进了不同的文字之中，或者说，那个如谢秋娘一般的形象，也碎裂如人生瓷器般的斑纹。

反正，我已十多年没读过潘向黎笔下这么血肉丰满、血脉充盈的形象了。作者转而致力于散文书写，不仅抛却人物，而且抛弃现实，一头扎进古代，无论是诗词还是茶茗，于历史或器物、人文之间的腾挪，使她收获了多部专题性散文集。而在诗词方面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和扩大。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从2021年开始，潘向黎在各大刊物上陆续推出一系列短篇小说，一共有七八篇的样子。几乎是每翻开一本文学杂志，潘向黎的名字便赫然在目，这就不是一个个别的事情了，对于评论家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挑战。温柔如向黎，也开始要掷“手榴弹”了，而且是“集束”的！

小说《旧情》应该是这一系列——我姑且称之为“上海故事”或“上海爱情故事”的较早的一篇，发表在《青年文学》2021年第4期，小说写的是齐元元和杜佳晋两人的情感史，原来两情相悦，中间离难磨折，最终又由于齐元元母亲生病而破镜重圆。当然，作者设计了一些误会，两人于情中的猜忌和试探，进进退退，但于反复间，两人还是谁也离不开谁。在这份感情中，母亲作为一个旁观者无疑也起到了媒介作用，但真正获得表达的是齐元元的心理，她由不自知的自卑走到了掌握自己幸福的自觉。这种人格成长应是令潘向黎更为开心的。

同样，《荷花姜》（《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讲的也是人格的觉醒故事。这部小说中有一位“看”者，也就是旁观者。这个作为小说中日料店老板的“旁观者”，多多少少代替了作者本人的“看”。所谓“荷花姜”是女主人公在日料店与男友一起吃饭总爱点到的一道小菜，有开胃功效，而且外观好看。对于这一道小菜，小说给出了详尽的知识性描写——这也是这组上海爱情系列小说的一个特点——对于饮食中的食物的描写之细致。读来有些续写《红楼梦》的意思，所谓“食不厌精”，一遇到食物，作者的笔每每逸出，有些“事无巨细”的意味。当然，物事仍要服从人事。这部小说的人事，在日料店主的“看”下几度伪装，到了结局，我们才知道这一对常来用餐的男女，原来不是店主想象的婚外情，而是两个自由身的恋爱。只不过一个是深陷其中，一个却因离异而对婚姻失了渴望，只想恋爱，不要结果，所以两人最终分手。而那个女子更自尊、更绝望也更决绝，爱而不得便放手离开。不知这是不是一种人格的成长？大约是吧，长痛不如短痛，但真的很痛。小说中有意思的一笔是，这场爱的“长痛”的承受者却是那个男性，离过婚但不打算与爱的人结婚，而爱的人离开后又心心念念。我想，那是向黎作为作家对这位男主人公的“惩罚”。所以，有时我觉得作家虽其善良——比如不愿将这个男主人公写得猥琐，他有情在，但作家也同样凛冽——那个感情的“寒冬”的确是作家给他的。

关于男性主人公的“恐婚”，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梦屏》（《大家》2021年第5期）。这部小说写了三个男人的“梦”，也是他们不同的感情生活与人格心理的写照。但无论怎么不同，他们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对步入婚姻的恐惧。小说“三折”，各个对于恐婚的梦的描述极为精彩，但更为精彩的是小说最后一个“他”对于“恐惧”的战胜。由女性人格到男性人格的过渡——那关注的点却也在“人”，因为任何爱情都只能在关系中发生，而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但是，等等。不可能是一个人吗？那么，关系的发生又如何成为可能？似乎潘向黎也对之满怀疑问，这个时代的爱情，或者说21世纪的爱情，与20世纪、19世纪有什么不同？是亘古永恒，还是也会在某个“拐角”处发生质的变异？所以，她的“手术刀”开始游弋，终于“划”到了“网恋”。《睡莲的香气》（《十月》2021年第4期）是一部非常散文化的小说，意绪、心理的着重，使得外在动作减至最少，也与网恋一事有着外形的呼应。一个男人一直以为与他在网上聊天的是一个女性，及至最后两个约好见面，他提前打量，才发现那人原来也是与他同一性别，这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及时逃离现场，回归到日常中。一场恍惚和拟想的爱情便也无疾而终。而主导着这场“哑剧”的，恰恰是人心中的对于他者的“想象”——这是一种自我镜像吗？这“想象”经由虚拟世界的放大更其虚拟，以至到了“虚无”的境地。潘向黎所要讨论的大约是这样一个虚拟时代的情感课题。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对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两个译本的探讨，也许这一笔是反讽的——不是对于文学，而是对于我们再返不回去的过去的“慢”时光，追忆者如你我，写作者“我”不也是那“镜中”的一个吗？也许这一笔的用意还在于，21世纪在某些方面也还勾连着它的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在情感的想象上，后人与前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呵，这“睡莲的香气”，这存在的“不存在”。真的，又有什么不同么？

《你走后的花》（《雨花》2021年第9期）和《天使与下午茶》（《北京文学》2021年第10期）比较起来，有些相似性，但我更喜欢《天使与下午茶》故事中一波三折中的对于爱的“信任”的研究。杜蔻和卢妙妙两位女友，可以说是无话不讲的闺蜜了，她们成人后的交往仍保持着少女式的亲密。在一座都市中各自忙碌，停下来时会相约一起，去港湾酒店里坐一坐，喝喝下午茶，各自讲讲身边的新鲜事，总之是在青春晚期和成人早期——27岁这样的年纪，彼此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委屈了也有个可以倾吐的人。所谓密友，一边是相互减压，一边是抱团取暖，还有呵，关键时刻可以有个交心的、出主意的人。杜蔻和卢妙妙正是这样的两个人。她们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内里仍是为对方着想，为对方高兴的。这两人的友情到了这一步，已是很不易了，多数时候，一个更单纯些，一个更有心计些，但也心计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多思些罢了。就是一个偶尔的下午茶时刻，一位新加坡商人与其中的一个不期而遇，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笑容的打动，便开始了一次试探的邀请，一盒巧克力，一个礼物的善意，好像也没有什么超出想象的地方。然而，两位女性的话题更新，有了新的去向——关于这位异地商人言家和的猜测，而理性的女友一直在提醒“别是骗子，别上当呵”，但置身其中的女友已然爱上。理性的女友的种种假设和担忧，全是为了沉入热恋中女友来日幸福的考虑，那些担心里也包含着我们的阅读史。不是么？我们阅读的文学史中不是常有这样的爱情“事故”，以至有时是搭了命上去的。

但是，事实是，言家和的爱是真的，他这个人也是真的，职业、感情、诚意，都是真的。当爱着的人沉醉其中，不无苦恼，最终需要一个人拿主意时，她的女友最终做到了。小说剧情反转，差点就往文学史中我们阅读习惯的文本和那些灰暗的命运走去。但是，潘向黎偏要给这位单纯深爱的女孩一个“天使”——其实我以为这个天使是双重的，一个是爱人的不辜负，一个是友人的不嫉妒。于是，在“天使”的呵护下，公主得到了王子。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谁说现代都市爱情故事中都是冷冬的利益和折磨，在这一点，潘向黎是位逆行勇者，她让幸福如期降临，不好么？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么？善得善报，爱得爱报。为什么非要去撕裂、去背叛？从这一点而言，上海是潘向黎的底牌——正如她曾感慨的那样，上海这个城市可以成就一个女孩所有的事，大意如此。在她作为这座城市的观察者多年之后，她终是走出了《十年杯》的忧伤和“谢秋娘”最后的“碎裂”，而将一个完好圆满的现代童话拱手托出——一切都是可能的，在一切的可能之中，爱之圆满应是最可能发生的。

这不是偶然，向黎相信它的必然性。

在我刚要结束这篇评论时，2022年第3期《人民文学》来到案头，翻开目录，向黎的名字赫然在上。这部新短篇是《兰亭惠》，篇名借了一间餐馆的名字，读过之后不免唏嘘，向黎的善意已然越过爱中双方，而以上一代人对爱的呈现或缝合讲述着生命之间的爱和惜护。于此，向这颗心表达一个多年好友的敬意。你还是你，岁月蹉跎，你又怎么会变？你还是你，对于爱的信念，就这样越过了也许是不可战胜的时间。对于一个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时间又奈我何？

爱你的英勇。向黎！

■关 注

我们时代的小说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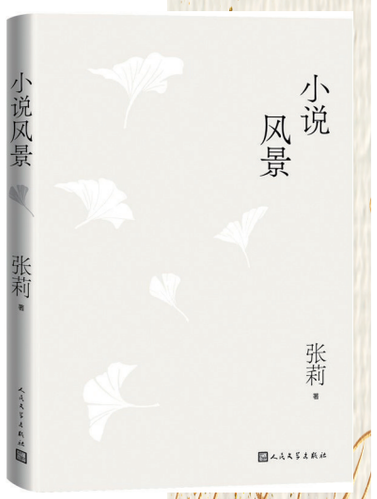
——读张莉《小说风景》

□程舒颖

优秀批评家总有一双慧眼。借助他们的视角再看那以前的小说，语言与情节，所有的材质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同样的文本猛然间又有了纵深。

张莉的《小说风景》提供了独属于她的眼光。这本书的前六章出自她2021年开设的“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后五章有发表于各大刊物的，既有莫言、余华、铁凝等优秀当代作家作品细读，也有《爱情九种》这样对百年来短篇爱情小说的分析和理解。张莉的目光所到之处，我们总是能发现其中敏锐的女性立场以及不变的人文关怀。

我们以前是如何看待祥林嫂的呢？印象里，那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可怜女人。死了孩子阿毛后，一遍遍对人说“我真傻，真的”，接下来是那熟悉的孩子被狼叼走的故事，直到听众逐渐麻木。在今天，遇到生活里特别啰嗦的人，我们也称其为“祥林嫂”，其中总有轻微的贬低意味。《小说风景》中，我们跟着张莉的眼光重看祥林嫂，仿佛亲身来到小说中的鲁镇，避开作者鲁迅营造的视角，以及一直以来的惯常解读，会发现这个女人不只是可怜那样简单。顺着张莉的解读，我们看到她最初是“健壮、有活力的女人”，她并不是束手就擒的人，而是一直用健壮的身体去反抗——反抗世界对她的压迫。原来，祥林嫂的力量在小说中被打压时，也被读者忽略了。



《小说风景》令人印象深刻地梳理了祥林嫂的六次反抗与自救，祥林嫂被卖到山里的那次，她“一头撞在香案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张莉带我们看到了祥林嫂的挣扎，甚至是她的“以死相逼”，那是她的反抗的唯一方式，也是最决绝的方式，却最终失败了，不得不顺从。丧子之后，她想靠劳动谋生，甚至去捐门槛来赎罪，但通通无效。最终，“一个人死后，究竟是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才抛向叙述者，也抛向世界，这是祥林嫂渴求她命运的难题的终极解决。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这个问句里包含了祥林嫂反抗与自救的历史，她的命运逻辑在我们面前愈发清晰，也愈发令人心痛。

读《小说风景》，我们的心终于和祥林嫂在一起，不是仅仅作为她故事的听众。跟着《小说风景》，重新看柳妈问祥林嫂被卖到山里时的问话：“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我们会有一种全新的愤怒，好像自己也翻身进书页，和祥林嫂一起面对“善女人”柳妈的诘难，以及祥林嫂内心的种种苦楚——《小说风景》带我们与祥林嫂共情。引起这种新的共情的秘密，其实早已隐含在小说里，张莉说，那是因为在《祝福》里，“小说家将祥林嫂还原成一个女人、还原成一个下层的女佣、还原成一个受困于各种话语及伦理的女人”。

再来看她解读萧红的《呼兰河传》。萧红是怎么去塑造其中的童养媳小团圆媳妇的？她因落落大方，一顿能吃三碗饭而饱受诟病，因此，婆婆打她，把她沉进大水缸，用开水烫她，名曰“请大神治疗”。这时，所有读者感受到的痛苦都是那么直接，字里行间，直逼人落泪。而在张莉的解读里，这痛苦却不是如此简单，作者引领我们想起那个曾为童养媳的祥林嫂，“鲁迅在写祥林嫂受迫害的时候，只是写了作为外来者讲述的迫害，而萧红则进入了内部”，在张莉看来，“小团圆媳妇最为悲惨之处在于，许多人认为是在救她其实是在害她。这深具象征意味。小团圆媳妇的错误在于她不符合庸众的想象，所以她被扼杀。”顺着张莉的眼光，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同情的不只是小团圆媳妇这个女性，痛恨的也不是早已消失的童养媳制度，而是看到了“不符合他人想象的人如何被他人折磨致死”，看到了“异类、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如何受戕害”。

于是，张莉看到了萧红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帮我们辨认出两位作家共同的批判对象：鲁迅笔下那个“无主名杀人团”——那些往小团圆媳妇身上浇开水的人，鲁镇里嘲笑祥林嫂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身为穷苦人对穷苦人的戕害，受迫害者对受迫害者的强压”，祥林嫂和小团圆媳妇，在写作时间间隔了十几年后，两个女性的影子又仿佛重叠在一起，甚至直到今天，更多有类似际遇的女性影子，也隐约与她们的重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祥林嫂与小团圆媳妇在今天仍然被读者们重读，成为我们心中无法抹去的人物形象？是什么让她们一次次地被看见、被重提，甚至在生活中有对应的事件或者新闻出现时，我们仍然一次次将那份相似的沉重情感投射到她们的形象中，来表达自己的同情、愤怒与心痛？

当鲁迅写作《伤逝》时，窗外是旧历新年热闹的祝福之声，他的心仍然感到寥落，想起“祥林嫂”悲凉的命运；当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她的身体已经抱恙，体力不支，可故乡呼兰河小城的过去仍然在她的脑海中回荡，她仍然难以忘却小团圆媳妇这样的“异类”。跟随张莉的视角去读这些经典的小说，我们惊讶地发现，几十年、近百年过去，这些经典作家笔下的人物依然鲜活生动，仍然需要被我们时代认知。

我以为，张莉致力于“重读”，作为批评家，她想要建立一种属于我们时代人的“文学的读法”。所以，当她看见经典小说里的女性，当她紧紧地将她们的形象、她们的遭遇同我们当下的价值观、当下人的境遇紧密结合，并引起今天读者深深共情时，她使这些历史中的文本回到了我们的时代，她引导读者去思索，如何在阅读这些经典小说时，镌刻下属于我们时代的回声。

当然，书中还有对其他小说写法与技术的有趣分析与评价，作者善于站在中国百年文学史的传承视野看文本。这也展现出《小说风景》是站在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立场看问题，既有专业性，又追求大众性。《唯一一个报信人》中，张莉对莫言的故乡书写有一个新鲜的评价，认为他是站在“庙堂与民间之间，乡野与都市之间”。但其实，她自己也是独特的“报信人”，她在将文学专业的学术批评用亲切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不矫揉、不造作，对经典不全然充斥赞美，她的眼光锐利，她以自己的美学方式理解。

相信普通读者在阅读《小说风景》的过程中，都会被张莉真切的感情、女性立场的文学观与宽阔的文学史视野所感染，情不自禁地跟随她重读这些优秀的小说。和《小说风景》一起，去文学中挖掘一些永恒之物，从“历史的文本中去体察新的美与愉悦，进而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的文学生活”，是有趣的阅读经验，借助她的视角，在迷眼的乱花中，我们会看到全新的风景。

■新作快评 徐刚长篇非虚构《自然笔记》，《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

唱给崇明岛的一首情歌

□王士跃

徐刚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生态写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长篇非虚构作品《自然笔记》展现出作家近年来对生态文明新的思考，主题侧重和写作手法都呈现出阶段性的思想转变和风格拓展，流露不同以往的美学向度。尤其是关于崇明岛的深度叙写，对出海口生态意义的艺术缕述，让读者顿悟青山绿水的静好，不啻为一篇生态文学的典范之作。

崇明岛作为中国第一大江流冲积岛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平卧在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面朝自然资源极其丰饶的东海，以其独特的地质形态和植物聚落，丰富多样的物种以及重要经济价值，历来占据着长江三角洲举足轻重的地位。出海口的观念常常被人们忽视，简单地将其他以百川归海大化于无形的表述笼统带过，实质上出海口内涵的复杂性远超过我们对它的认知。有生态学家称出海口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为可贵的资源之一，在生物生产力方面可与热带雨林相匹敌”（戴尔·詹姆斯）。尤其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分布的出海口区域，生态物种呈现了鲜明的层阶性递序，由森林、沙草到滩涂、浅湾，丰富的物种和而不同地相互依存，因此出海口的生态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徐刚而言，崇明岛这片出海之地首先是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那时候生态和谐的概念在一个孩童的心里只是一片混沌的淳美，是充满温情幻想的芦花洲屿，到处是水润清新的世界，他一出生“就在水边了”。他睁开好奇的眼睛，所见宅沟沙河、绿树野花组成斑斓世界。他慢慢长大，奔跑在开满金色油菜花的耕地和辽阔的沼泽与沙洲。他和小伙伴们赤条条在水中玩耍，斗胆探险大芦苇荡，看小鸟哺育新生命。“水边丰富而辽阔，有各种生命在水里、地上、地下。水边集生命之大成，淡水与咸水滋润着我少小的心灵。”那时候崇明岛仍是原生态的，岁月静好唤起我们共同的遥远乡愁。多少年以后，成为一位以关怀生态文明为己任的作家徐刚，看到的是更为深邃和复杂的一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崇明岛变成了更加整体和综合的深度扫描，他要告诉我们，故乡不只是一张淳美清新的明信片，更是一座蕴涵丰饶的自然宝库。他的观察更趋严谨科学，叙述细腻生动，在广角与聚焦交替的掠景节奏中为我们精心描绘了令生态作家神往的圣土：东滩。

东滩，这一片长江鼻尖上的稀有大泽，是依傍着太平洋西端，覆盖两百六十多平方公里，欧亚大陆最为成熟的广袤湿地，见证着陆海变迁的版图和生态消长演替的自然历程，成为世所罕见的物种休养生息的珍土。作者以抒情的文字张力和科学化的解析引领我们一同漫游大滩涂奇境。

东滩显示了不同的生态物种区块，高程区有伟岸的芦苇荡，依序而下则为薦草、海三棱草和丝草植物带，再矮下去的便是新地滩涂。不同的生态区块繁息着殊异的种群。小鸣雀喜欢安家大芦荡，鸻鹬鸟类、天鹅则偏爱海三棱草食物区，雁群喜食嫩芦根，国家一级保护鸟禽白头鹤则逡巡滩涂，寻食壳类、鱼虫等底栖生物，那些底栖的生物则又依赖丰富的藻类植物、浮游生物和泥沙中的各种营养而存活繁衍。这是一个精彩华丽的生态家族，是大湿地鲜活生命的完美生态链。百万只的候鸟、留鸟和数百个水生物种共栖共息于此，皆在动态之中保持平稳均衡的延续和演化，正如作家所说：“它具有鲜明的动态性、物种多样性，它始终处于沧海桑田的神妙过程中”。

可是如此美妙丰饶的生态宝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遭逢了相当程度的破坏，过度经济开发给植物、水源及生物栖息地带来严重伤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徐刚开始了生态文学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极具震撼的警世之作，为他的故乡崇明岛，为中国整体生态危机而大声疾呼。那段时期他发表了《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沉沦的国土》等激情忧愤的报告文学。我们姑且将这些视作徐刚为崇明岛的迷失和凋落而写的悲歌，为中国青山绿水的失色与污损而抒发的哀叹，然而时过境迁多年后，呈现眼前的这篇《自然笔记》则不复当年凌厉的批评者之姿，取而代之的则是柔情温婉的笔触和宽容呵护的情感。徐刚为今天的崇明岛新貌献上了一首赞歌，为焕发了容颜与娇媚的宝岛唱出了一首情歌。作家的内心感受由此转变了，于是笔锋也显得温润多情。

在写作手法上，徐刚似乎回归古典，流露一种恬静闲适的诗意。叙述过程偶尔植入古文虚助词，使语气节奏悠扬舒缓，意蕴深远。他本人曾经表明，今天的中国生态文学已进入新的阶段：“渐次深入至家园土地，草木虫鸣，渐富诗性，于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其格调及语言文字有极强的汉语文化特色”，这可视为徐刚本人写作风格逆转的一个注解。在当今中国生态作家群体中，徐刚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承前启后性的大家，他既是高超的诗人，又是淹贯古今的文化学者，尤能博采众家，古为今用，在继承古典文学与拓展生态文学表现空间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非虚构作品《自然笔记》中，作者围绕着长江集水域游目四顾，纵横古今，始于故乡崇明岛，终于长江之源姜根迪如，为我们俯瞰了这条灿烂古江的前世今生，为崇明岛抒写了更具魅力和活力的生命诗卷。